

美德日韩智库对比分析与启示

王晓琳 董 诚 曾 文 张运良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 100038)

摘要: 2015年1月20日我国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旨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由于国外智库发展起步早,因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不仅要结合本国国情,更要注重借鉴国际智库发展建设的经验。文章采用比较法、文献调研法,从机构独立性、人才机制、研究成果转化、国际合作、咨询服务5个方面对美德日韩智库机构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国际智库建设的特点,并从加强智库建设角度提出对我国智库的启示。

关键词: 智库; 比较分析; 机构独立性; 人才机制; 研究成果转化;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中图分类号: C93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772/j.issn.1674-1544.2018.04.005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Think Tanks between America,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WANG Xiaolin, DONG Cheng, ZENG Wen, ZHANG Yunliang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On January 20, 2015, our government issued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iming at building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hink tanks,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not only be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but also draw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s. By means of comparative method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ink tank institutions of America, Germany,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independence, talent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sulting services.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national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and maps out the enlightenment to China's think tan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ink tanks.

Keyword: think tank, comparative analysis, organizational independence, talent mechanism,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nsulting services,

作者简介: 王晓琳 (1993—), 女,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情报理论与方法; 董诚 (1970—), 男, 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 研究方向: 情报理论与方法; 曾文 (1973—), 女, 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情报理论与方法 (通讯作者); 张运良 (1979—), 男, 博士,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 知识组织。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事实型科技大数据的情报分析方法及集成分析平台研究”(14BTQ038); 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建设项目“知识组织体系建设”(CKCEST-2018-1-26)。

收稿时间: 2018年4月10日。

0 引言

智库是由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情报人员组成的,为决策者提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目标领域的方法、策略、建议,是一个非营利性的自适应组织^[1]。当今社会,智库的目标集中体现在为用户提供咨询服务以辅助其做出决策、对某个领域或环境进行监测以发现其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进行舆情监测以预防某种风险情况产生、对未来事件做出预测等方面。国外智库发展起步早,已处于成熟阶段。例如:美国智库在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2],多是以政策为导向,为联邦政府、企业等提供决策支持。2018年1月30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指出,2017年全球智库总数为7815个,其中,美国智库的数量为1872个,居全球第一,且顶级智库前10名中有5名都是美国智库^[3]。德国智库是发展历史悠久的智库之一,而且智库理念、组织形式等与中国智库最为相近^[4]。20年来,德国智库不断发展创新,注重创建科技决策智库^[5],建设政党意识形态智库。德国智库总数为214个,居全球第六。全球顶级科技决策智库前12名中德国占2位,其中马克斯·普朗克协会(MPG)为第二名,发展研究中心(ZEF)为第十二名;在全球政党联盟“最佳智库”排名的前10名中德国占5名^[3]。日韩智库发展水平较高,在东亚的日本、韩国、印度三国顶级智库榜单前10名中,日本智库有3个,韩国2个,印度2个;第一名和第三名是韩国智库,第二名为日本智库^[3],前3名均为日韩智库。

本文拟对美、德、日、韩的9家智库机构(表1)就智库运营的独立性、智库人员来源与构成、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智库的国际合作、智库的咨询服务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总结阐述国际智库建设的特点,并从加强智库建设角度对我国智库建设提出对策和建议。

表1 美、德、日、韩9家智库机构

国家	智库机构
美国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
美国	美国国家技术信息服务局(NTIS)
美国	兰德公司(RAND)
德国	马克斯·普朗克协会(MPG)
德国	发展研究中心(ZEF)
日本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
日本	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NII)
韩国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
韩国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KISTI)

1 智库运营的独立性

(1) 美国智库

美国智库运营的独立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的独立性,二是资金来源的独立性^[6]。研究的独立性指的是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可鉴性,不会为了某一方或者是某一组织的利益而影响研究结果。例如: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的产出报告和备忘录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是会在国会议员和国会专门委员会的立法审议和决策中发挥作用,可见其研究的客观可鉴性。资金来源的独立性体现为:一般美国智库的资金不仅来源于政府,还来源于基金会、大学、慈善机构以及私人企业等。例如:兰德公司是一个非营利,无党派的组织,其资金来源为:美国政府机构赞助,包括美国州和地方政府;非美国政府机构和部委、国际组织、高校、基金会、专业协会等的资助;一些非营利组织和私人企业的资助。这就使得兰德公司始终保持资金独立性。图1为兰德公司2016年收入来源分布^[7]。

(2) 德国智库

德国智库运营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资金上,资金来源渠道广泛。但由于德国希望机构职能能够与企业特殊利益划清界限^[8],所以资金多数来自于政府公共部门,对政府的依赖性可能较强。同时,由于其资金来源稳定,能够保持独立运营。例如:马克斯·普朗克协会(MPG)的融资主要由公共部门的基础融资组成,在2017年,MPG融资约为18亿欧元。此外,马克斯·普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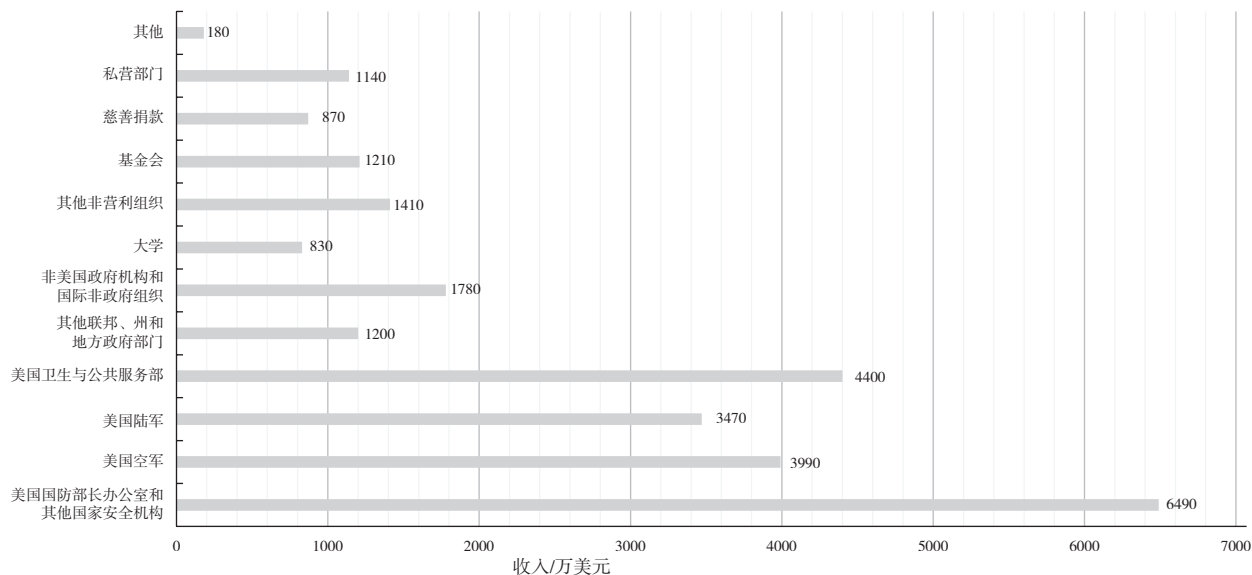


图1 2016年兰德公司收入来源分布

克协会及其所属研究所还接受来自公共和私人捐助、欧盟第三方的项目资助的资金。德国发展研究中心（ZEF）由公共基金供资，但获得的大部分资金（其预算的80%）用于研究基金的竞争性市场。ZEF的主要资助者是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MBF）、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菲亚特基金会、蒂森基金会、拜耳股份公司、大众汽车基金会、德雷耶基金会、联合投资以及其他许多组织。

（3）日本智库

日本智库运营的独立性参差不齐，缺乏研究独立性。部分智库资金来源稳定单一（源自政府或者主办机构），这就使得其对于政府或主办机构的依赖性非常较大，缺乏研究独立性。如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这样的国家级智库，其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2015年，其经费总数约为1189亿日元，而这其中，政府拨款就占了约95%^[9]。这类机构由于资金来源于政府，来源稳定而不用担心，但研究结果可能与利益相关，缺乏研究独立性。而部分政府资金拨款不足、企业资助少的智库，其主要采取委托研究的运营模式，这就使得其研究深度、广度不够，导

致研究存在偏颇，使得机构独立性缺失^[10]。

（4）韩国智库

韩国智库运营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研究上，部分智库存在运营资金不足的状况。韩国智库目前实行的是国家政府统筹管理的模式，不再由各地方政府部门管理，与各级政府不存在人员管理、财务支持的关系，只是存在业务上的关系。这样智库机构开展的研究就更为客观，其研究独立性更强^[11]。部分智库资金大多来自政府资助，例如韩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KISTI）是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其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尚有部分智库存在运营资金不足的状况，仍然需要接受外部委托来支持机构运营。

2 智库人员来源与构成

（1）美国智库

美国智库人员实行“旋转门机制”，即政府官员、智库研究人员、高校教授专家三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人才交流。智库会为高校、政府等培养输送人才，而政府官员、高校教授学者卸任退休后也有机会进入智库，成为研究人员^[12]。例如：美国军方长期派5个校级左右的军官在兰德公司工作，以保持美国军方与兰德公司的交流。目前，Hans Pung是兰德欧洲公司的总裁，在加

入兰德之前, Hans Pung担任美国陆军工程师, 负责英国, 韩国和德国的后勤、人员、作业以及海外服务。“9·11”事件之后, 他还领导了五角大楼紧急权力反应小组。

(2) 德国智库

德国智库人员实行“宁遗勿滥机制”, 即机构研究人员数量较为精简, 但对其研究人员的学历专业能力等要求很严格^[4], 一般研究员均为科学家、博士、博士后、高校教授等。由于德国机构研究员其身份明确清晰, 基本上没有离职研究人员到政府工作, 所以德国智库鲜少出现“旋转门机制”。另外, 对于人才的培养选择较为开放, 以自主选拔为主。例如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 是由世界领先的研究人员建立的。他们自主选择研究课题, 并给予最佳的工作条件; 自由选拔人员, 营造适宜于研究人员自身的最佳工作环境。

(3) 日本智库

日本智库实行“宁遗勿滥”与“人才派遣”相结合的人才机制。研究人员的质量要求高, 且注重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 实行人才派遣制度, 即智库将年轻研究员派遣到某个政府机构、学校、企业等进行1~3年研究学习; 政府机构官员、高校学者等可以到智库机构进行1~3年学习, 工资由原机构支付, 派遣学习结束后, 依旧回到原单位^[13]。例如: 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NII)的研究员可以申请派遣到日本科学促进会(JSPS), 即申请日本科学促进会(JSPS)特别研究员即可; 其也接受委托研究员, 即来自私人公司企业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均可申请进入NII学习。

(4) 韩国智库

韩国智库人员实行“知行合一机制”, 即注重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例如: 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为国内外学生提供了独特的研究生课程, 以获得知识和实践经验。学生有机会参与实际的研发项目, 在实际工作场所获得第一手经验, 并在各自领域接受研究性教育和培训。不仅包括本国人才培养, 还吸收国外人才成为本国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主要研

究人员。另外, 韩国智库同样也注重人才的聚集以及知识的共享。例如: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KISTI)建立韩国国家技术工程师网络(KOSEN)平台, 将来自世界各地的韩国技术工程师连接在一起, 通过该网络平台分享知识, 为研究人员提供各种服务, 形成了一个虚拟的智库。截至2016年, KOSEN已经在70个国家发展成为拥有13万名会员的庞大网络。自1999年以来, 科学技术部、教育科学技术部、未来创造科学部和科学技术信息部均可利用该平台进行项目研究。

3 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

(1) 美国智库

美国智库专注于智库研究成果转化的传播, 为联邦政府提供政策上的支持服务, 以增强报告的影响力。例如: 兰德公司每年提供的成果产出有: 标杆分析, 案例分析, 成本分析, 经济分析, 建模、仿真和优化, 性能测量和测量开发, 政策分析, 计划评估, 风险评估与分析, 策略计划, 调查研究, 技术评估和发展等12种类型的报告, 将其中不涉密的部分内容上传到官网供公众阅读、下载。另外, 公众还可以在推特上进行兰德评论, 以增强全民参与性, 从而扩大成果传播。

(2) 德国智库

德国智库关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联系, 并且注重知识传播。例如: 马克斯·普朗克协会(MPG), 扩大与弗劳恩霍夫协会在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纳米和生物技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研究, 另外还建立了其子公司马克斯·普朗克创新有限公司, 将专利和技术带入市场, 并协助产生创始人根据马克斯·普朗克协会的研究成果成立新公司。自1979年以来, 技术转让公司已协助产生了约4000个发明, 并签署了2300多个许可协议。总的来说, 马克斯普朗克创新已经为发明家、研究机构和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创造了超过4亿欧元的收入。

(3) 日本智库

日本智库注重产学研合作。例如：作为网络型研究所，JST主要推进与革新相关的研究开发，通过研究成果的实用化和国际共同研究，应对经济、社会的挑战。支持大学知识产权管理，技术转让和产学合作等活动，为创新创造贡献力量。同时，为解决研究成果无法应用的问题，JST正在推动“开发整合”“外包开发”等项目作为研究机构与产业之间的桥梁。NII也建立了产学合作中心，包括金融智能数据研究中心、认知创新中心。另外，NII的国际高级软件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是世界领先的软件研究中心，将和海外的研究机构联合开展研究、教育和实践三位一体的工作，并作为产学合作的一部分。

(4) 韩国智库

韩国智库关注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和产学研的合作。目前处于将其成果转化应用于中小型企业阶段，推动其发展创新，目标是致力于达到基础研究转化阶段。例如：KISTI设有小型企业创新总部，通过需求响应支持推动中小企业未来发展。其包括：根据公司规模/成长阶段加强定制信息支持，激活产业—学术—大学知识生态系统，建立研发规划、业务和全球支持体系，扩大和加强Supercomm的M&S等。而KIST属于产业技术研发机构，由于环境的不断变化，其定位从技术学习、合同研发到中小企业的技术供给者，再到基础研究转化的阶段。目前，KIST正在集中研究能力，确保将其研究成果转化为韩国企业更大的竞争力。

4 智库的国际合作

(1) 美国智库

美国智库在他国设立办事处，建立面向他国用户的网站，较多体现在国际安全（反恐）、能源、环境保护等研究领域。例如，兰德公司在英国和比利时设有办事处，并建有面向中国用户的网站。此外，2017年8月28日，兰德公司接收了来自唐氏基金会的300万美元捐赠，用于设立中国政策研究讲席教授职位——唐氏席位，并开展和管理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研究，与中国研

究机构建立联系、组织座谈会、交流项目及联合研究项目。

(2) 德国智库

德国智库建立国际合作中心和建立国际间的伙伴关系。例如：MPG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全球范围内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参与了超过2500个项目，在100多个国家拥有5000名国际合作伙伴。2005年，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上海成立了“计算与理论生物学”研究所。而德国波恩大学发展研究中心（ZEF）主要是针对与发展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其特征是与世界各地有这类需求的国家和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以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和手段科学解决发展相关问题。

(3) 日本智库

日本智库通过制定合作计划和参与国际合作项目开展国际合作。例如：JST有两个计划：一是国际科技合作计划（SATREPS），二是战略性国际合作研究计划（SICORP）。NII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主要有：国际量子信息科学研究中心：旨在将计算机科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聚集在一起，为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奠定基础；网络物理信息国际研究中心：推动前沿研究和合作等活动，将NII建立成为世界级的网络—物理系统国际枢纽；大数据数学国际研究中心：推动前沿研究和人才开发等活动，把NII建设成世界一流的大数据国际枢纽，重点发展高速算法。

(4) 韩国智库

韩国智库侧重于与世界各地的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交换研究人员开展项目研究，并建立了信息资源对外发布机制。例如：KIST支持创新的国际计划和举措，并直接与国际社会、国家和合作机构合作。目前，已有80多个合作机构与世界各地的KIST进行合作，包括美国、日本和德国的KIST。这个广泛的网络使KIST能够积极开展国际研究项目、主办国际会议、交换研究人员，并启动了其他相关计划。而KISTI不仅关注将国外科技文献引入国内，同时也非常关注将韩国国内的科技文献等传播到国外，他们建立了Korea Science，将韩国优秀的科技期刊发布到海外，建

立了信息资源对外发布机制。

5 智库的咨询服务

(1) 美国智库

美国智库注重辅助政府决策制定，对政府的决策制定，法规制定等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例如：兰德公司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它的研究分析多是辅助进行预测、制定决策，通过研究和分析改善政策和决策制定，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而CRS以数以百计的各领域研究人员以及国会图书馆强大的专家和文献资料服务为后盾，为国会议员及各专家委员会提供立法全过程的咨询服务工作，目前已成为国家高层决策支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德国智库

德国智库注重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引导公众舆论^[4]。智库通常会向公众陈述其观点，传播其政策建议。通常是以面向全社会的形式开展讲座或者研讨会，在非学术环境的背景下向民众传达其想法建议，以期获得民众的支持，产生共鸣。之后，则会在议会等具有决策权的会议上提出建议从而使决策获得制定。例如：ZEF会举行与政策相关的部分论坛来引导公众舆论，获得支持。

(3) 日本智库

日本智库注重调查研究，缺乏对决策咨询智能的关注。目前处于政策制定的停滞期，就整体而言，其调查研究职能比政策制定职能发挥的影

响力大^[4]。这一点与欧美智库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虽然其在政策咨询中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受到“官僚”主义的影响较大，其决策制定缺乏民主客观性。由于其历史发展和国家价值观，日本的决策制定主要由行政机构把控，对于像民间智库这类的机构根本没有话语权，自然也就不存在提案权，所以其决策制定流程缺乏客观科学性。

(4) 韩国智库

韩国智库注重为政府、企业、研究人员等的决策提供咨询。韩国政府作为政策咨询的委托人，不具有直接参与决策制定的权利，其政策制定的过程都要通过智库机构来实现。另外，韩国智库也为部分企业、研究人员提供决策咨询，例如：KISTI为公司和研究机构提供信息，为其精密研发奠定基础，还提供定制的信息分析服务，使研究人员和中小企业能够按时做出正确的决策。

6 结语与启示

本文从机构独立性、人才机制、研究成果转化、国际合作、咨询服务5个方面，对美、德、日、韩9家智库进行对比分析。对比结果如表2所示。

通过表2对美、德、日、韩4国智库机构的对比分析发现，虽然各个国际智库建设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从宏观角度看，目前国际智库的发展基本处于成熟阶段，对我国智库建设具有借鉴

表2 美、德、日、韩智库建设特点对比分析

比较特点	机构独立性	人才机制	研究成果转化	国际合作	咨询服务
美国智库	研究独立，资金独立	旋转门机制	专注智库成果转化传播	在他国设立办事处，建立面向他国用户的网站等	注重辅助政府决策制定
德国智库	资金独立，缺乏研究独立	宁遗勿滥机制	关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间联系，注重知识传播	建立国际合作中心，建立国际间的伙伴关系	注重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引导公众舆论
日本智库	缺乏独立性	“宁遗勿滥机制”与“人才派遣机制”相结合	注重产学研合	开展国际合作计划，参与国际合作项目	注重调查研究职能，缺乏决策咨询服务
韩国智库	研究独立，缺乏资金独立	“知行合一机制”	关注基础研究转化，注重产学研合作	与世界各地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交换研究人员开展项目研究；并建立信息资源对外发布机制	注重为政府、企业、研究人员等制定决策

表 3 国内智库现状

主题分布	研究内容及相关文献
各类型智库的研究	高校智库、体育智库、科技智库、农业智库等。以高校智库居多。例如：陆雪梅 ^[15] 在新型智库建设背景下，分析图书馆服务高校智库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图书馆服务高校智库建设的相关对策
智库的相关建设服务研究	智库建设模式、运行服务机制等。例如：林志华 ^[16] 从概念范畴、服务方式、服务内容、作用影响、障碍因素、发展策略等方面对图书馆智库建设服务进行研究
智库问题及建设研究	我国智库现存问题、建设建议等。例如：付卫东 ^[17] 等指出我国教育智库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智库人员独立性不足、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滞后、创新力不强、社会影响力较弱，并对此提出相关建议
国外智库启示研究	多为具体研究某一智库各个方面，予以我国智库启示。例如：周瑛 ^[18] 等运用PEST模型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对日本智库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为我国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建议
智库比较研究	基本均是中美智库比较，欧美智库比较，日韩智库比较。其中，中美比较是主流。例如：卢江阳 ^[19] 从科研项目生产机制、创新机制、推销机制 3 方面对中美智库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我国智库的科研管理运行机制角度提出对策

意义。我国智库研究的现状如表 3 所示^[15-19]。

结合美、德、日、韩四国智库建设的特点，针对我国智库建设的现状与不足，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1) 建立健全保障智库资金的政策法规。我国智库的资金来源基本上来自于政府拨款，存在与日本智库相同状况，缺乏独立性，缺乏能独立支撑智库运行的产业线。这就使得我国智库对政府有很大的依赖性，导致研究缺乏客观性，对其长久发展存在不利。所以，我国需要建立健全保障智库资金的政策法规，以形成一条能支撑机构独立运营的资金链。第一，各级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鼓励政府、研究机构、高校、企业等加大对智库建设的资金投入，实行针对智库的公益捐赠制度，鼓励社会和个人进行捐款资助，形成竞争性资金投入与稳定性资金投入并进的格局。第二，应根据自身特点以及相关需求，规范各自的资金流，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发挥各级各类智库的研究特色，实现智库的独立运营。第三，加强对智库资金出入的监管力度，建立资金来源和输出的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坚持问责到人，完善监督。

(2) 加强智库人员队伍的建设。我国智库缺乏合理的人员构成以及工作范畴^[20]。我国智库的人才储备大多来自于高校和科研院所，且大多是文科背景，缺乏来自于政府、企业的人才，缺乏具有数学、统计学等理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另外，我国智库一味地强调科研人员的比例，但却

忽略了科研人员真正从事的工作，大多科研人员的工作都被日常的行政事务影响，难以专注于项目研究。所以，我国需要加强智库人员队伍的建设。一是吸引年轻人才，培养专业的智库人才队伍；二是吸纳政府部门的离任人员参与智库的研究工作；三是将智库研究人员派遣到企业、高校、政府等机构，以加强其专业能力；四是建立全球化专业人才交流平台，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研究人员联络在一起，形成虚拟的智库，以达到集中智力解决问题的目的；五是合理规范智库人员的工作范畴，增设行政工作岗，使科研工作者专注于项目和学术研究。

(3) 优化智库研究成果转化机制。我国智库存在研究成果转化率低，知识共享意识不强，智库研究成果缺乏科学的评价机制等问题。所以，我国需要优化智库研究成果转化机制。第一，智库注重基础研究课题，创造出新颖的决策指导，发挥智囊团的作用；第二，加强各层面的产学研合作，将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报告、咨询建议等）与应用联系起来，推进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第三，建立智库成果发布制度，推出智库产品，最终将知识化为经济和社会价值，使得科研成果能够应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创造经济效益；第四，实行智库研究成果科学评价机制，建立用户评价、专家评价、同行评价相结合的考核体系；第五，将知识共享概念写进全民普及的范畴，从教育、社会、媒体入手，对公民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知识共享意识。

(4) 深化智库的国际交流合作。我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不高, 缺乏国际合作协调性。国际合作缺乏主动性, 多为被动式合作, 合作对象缺乏主动筛选; 智库视野不够开阔, 缺乏长远合作规划, 国际合作多为短期合作; 国际合作地位边缘化, 没有占据核心主体地位。所以, 我国需要深化智库的国际交流合作。第一, 我国智库要与国际国内多家智库建立伙伴关系, 建立国际合作中心, 为共同开展合作项目, 保持长久合作关系做准备; 第二, 加强对国外科技创新的相关政策的关注获取, 为我国科技创新打好基础; 第三, 主动开展国际合作交流项目, 主动选择合作对象, 占据合作的主动性以及核心地位; 第四, 在国外建立我国智库的分部, 扩大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

(5) 推进智库的决策咨询服务。我国智库缺乏对“决策咨询服务”的关注, 其长期以来的服务更多的是偏向于数据的加工处理、信息的传递服务, 对于决策制定、作出预测这一本质服务并没有做到, 长期偏离本质服务, 就形成了我国智库建设的一大困境^[21]。所以, 我国需要推进智库的决策咨询服务。第一, 推进与政府、企业、公众等之间的联系, 加强智库的决策咨询服务; 第二, 智库决策要拓宽对外宣传渠道, 利用微博、微信等媒体将预备决策告知人民, 以引导公众舆论, 促进决策最终制定; 第三, 完善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 智库可以将其产出的咨询报告、发展规划、决策论点等按照公开招标、委托执行、项目合作的方式卖给政府、企业等, 从而增强智库的发展优势。

参考文献

- [1] 赵阳, 文庭孝, 姜珂妍. 我国智库研究文献可视化分析: 以CNKI为例[J]. 情报工程, 2016, 2(4): 40-48.
- [2] 乌兰图雅. 美国智库经验考察启示[J]. 智库时代, 2018(1): 123-125.
- [3] JAMES G Mcgann.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EB/OL]. (2018-01-30)[2018-03-25]. https://repository.upenn.edu/think_tanks/13/.
- [4] 刘潇潇. 德国智库的运营机制及启示[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2017(2): 111-124, 128.
- [5] 胡海鹏, 袁永, 廖晓东. 世界顶级科技决策智库建设经验及启示: 以德国为例[J]. 决策咨询, 2018(1): 19-22.
- [6] 张志强, 苏娜. 国际智库发展趋势特点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J]. 智库理论与实践, 2016(1): 9-23.
- [7] RAND. 关于兰德公司[EB/OL]. (2017-03-22)[2018-03-25]. <https://www.rand.org/zh-hans/about.html>.
- [8] 闫志开, 王延飞. 智库运转机制比较分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5, 38(5): 5-11.
- [9] 付岩. 发达国家科研创新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特点及启示: 以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院和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为例[J]. 中国科技资源导刊, 2017, 49(3): 97-103. DOI: 10.3772/j.issn.1674-1544. 2017. 03.017
- [10] 曹如中, 梁亚丽, 宋雅雯, 等. 智库建设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其启示[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8, 41(5): 97-103.
- [11] 蒋晓飞. 日韩智库比较及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启示[J]. 法制与社会, 2016(19): 248-249, 265.
- [12] 王莉丽. 美国智库的“旋转门”机制[J]. 国际问题研究, 2010(2): 13-18.
- [13] 胡薇. 日本智库的发展现状及启示[N]. 光明日报, 2016-11-16(16).
- [14] 刁榴, 张青松. 日本智库的发展现状及问题[J]. 国外社会科学, 2013(3): 79-88.
- [15] 陆雪梅. 高校图书馆服务新型智库建设的思考[J]. 图书馆学研究, 2016(8): 79-82, 88.
- [16] 林志华. 我国图书馆智库建设服务研究综述[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7(6): 46-51.
- [17] 付卫东, 付义朝. 我国教育智库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展望[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56(2): 167-176.
- [18] 周瑛, 刘越. 日本智库概况及对我国智库建设的启示[J]. 新世纪图书馆, 2017(11): 74-77.
- [19] 卢江阳. 完善我国智库科研管理运行机制的对策思考: 基于中美智库比较分析[J]. 理论月刊, 2018(2): 172-177.
- [20] 徐峰. 科技情报与科技智库的融合发展探析[J]. 情报工程, 2017, 3(5): 4-11.
- [21] 王延飞, 闫志开, 何芳. 从智库功能看情报研究机构转型[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5, 38(5): 1-4, 11.